现代化之启蒙——

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与俄国发展道路探寻

□张建华

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是一股特殊的社会力量，它发挥了规划者、鼓动者以及领导者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纵观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平民知识分子、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都通过自己不懈的理论探寻和忘我的实践精神探寻适合俄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并以自己的方式推动俄国现代化向前发展。

俄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较为独立的社会群体最终形成于19世纪30、40年代，其典型标志是在这个时期在俄国知识界围绕着俄国向何处去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大论战，并且在知识分子内部形成了政治分野，最终划分出两大营垒——西欧派阵营与斯拉夫派阵营。

长期以来，由于俄国在地理环境上的独特位置，即国家版图横跨欧洲和亚洲大陆，深受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从第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开始，直至20世纪初，俄国的历史发展犹如巨大的钟摆，摆动于“西方式”与“东方式”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之间：公元10世纪，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以强制的方式率众皈依东正教，拉开了俄国“西方化”的序幕，这一过程持续到蒙古鞑靼人入侵前的13世纪40年代；从13世纪40年代至15世纪80年代，俄国经历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来自蒙古鞑靼人的统治，被迫走上了“东方化”的道路，尽管1480年终于摆脱了异族的统治，但是“东方化”进程以其惯性仍然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直至17世纪末；从18世纪初至19世纪初，这是俄国历史上急速的“西方化”阶段，先有彼得一世急行军式的“西方改革”，后有女皇伊丽莎白，特别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君主专制”，在他们的统治下，俄国的“西方化”进程加速了；而从19世纪开始，俄国历史发展的“钟摆”似乎失去以往的规律性，迟疑并固执地摆动于“东方”与“西方”之间，它表现为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式”的统治和他所支持的斯佩兰斯基改革是西方式的，但他同样支持的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制”却是典型的东方式的。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的目的在于解放农奴，赋与其人身自由权利，但不放心的沙皇政府又试图以“东方式”的村社将农民禁锢起来。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资本主义艰难地迈开其步伐，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政治上，专制制度仍然是一夫当关，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顽固地坚持“东方式”的超级集权统治。俄国的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进程长期深陷于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恶性循环之中，它坎坷多难的命运引起了自觉意识渐强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关注，由此酿成一场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大辩论。年轻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以他们艰苦的理论探寻，寻找着俄罗斯社会的发展方向，规划着俄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争论的焦点即是俄罗斯向何外去，即是走西方式的道路，还是走东方式的道路？这个长期存在于俄国知识界的问题被称为赫尔岑式的历史命题，赫尔岑称它是“俄国生活中的斯芬克斯之谜（Сфинкс русской жизни）”。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入，俄国知识分子的内部依据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认识水平发生了第一次政治大分野，最终划分出两大营垒——西欧派阵营与斯拉夫派阵营。

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是阿·斯·霍米亚科夫，康斯坦丁·阿克萨克夫，伊凡·阿克萨克夫，伊凡·基列耶夫斯基，彼得·基列耶夫斯基，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斯拉夫派认为俄国自古即拥有优秀的文化和传统，认为俄国的农村村社、东正教和专制制度是俄国独有的特性，俄国完全可以根据俄国的历史特点，走迥异于西欧的发展道路。在他们的眼里，走西方式的道路对于俄国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彼得一世的改革则毁灭了俄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他们一般反对对农奴制和专制制度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他们甚至主张回到彼得一世以前去。这一派知识分子许多人来自贵族和地主阶层。

西欧派的代表人物是巴·瓦·安年科夫、康·季·卡维林、吉·尼·格兰诺夫斯基、彼·雅·恰达耶夫等。该派主张俄国无法孤立于欧洲，固步于自己的传统，俄国必将走与西欧一样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事实上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已经把俄国拉上这条道路，他们大多视农奴制和专制制度是限制俄国历史发展和走西方式道路的阻碍，主张予以废除。这一派的知识分子大多来自平民阶层。

从一定程度上讲，在19世纪30-40年代的思想大论战中，西欧派的重要人物、著名哲学家和作家彼·雅·恰达耶夫于1836年发表于《望远镜》杂志上的一系列《哲学书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恰达耶夫在第一封信中将落后的俄国与先进的西欧进行了比较，他痛苦地回顾了俄国发展的曲折历史，毫不隐讳地批判了俄国的专制制度。在他的眼里，“我们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种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到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种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他热情地歌颂了18世纪初彼得一世进行的改革，“曾经有一位伟大的人，想要启蒙我们，为了让我们爱上教育，他向我们投来了文明的斗篷。我们捡起了斗篷，却没有去触动教育”。

恰达耶夫大胆的话语震动了整个俄国，他的书信的发表被称为“恰达耶夫事件”而列入沙皇政府的宪兵第三厅的档案之中。沙皇尼古拉一世宣布《哲学书信》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并下令关闭《望远镜》杂志，并追究有关人的责任。

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欧派，他们都是由俄国社会中那一部分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都是立足于俄国传统与现实，并且将俄国与西欧做以多方面的比较，都是不满于俄国的现状，苦思于探索俄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答案。如同赫尔岑所说：“我们大家都有爱，但具体说来爱与爱又不相同。”西欧派的主张是激进的，但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民族虚无主义色彩；斯拉夫派的主张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保守色彩。但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这一场持续十余年的争论表明俄国知识分子的队伍已经形成，并且日益成熟地和广泛地显示其渐强的独立性，以及其对国家政治生活强烈的参与性。

纵观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大势，几乎近代的每一个国家在经历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之前，都必然经历一个思想启蒙的时期。因为现代化的发展首先需要思想意识的现代化，即先进思想观念的传播、先进政治理论的创建，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历史性变革大造舆论声势、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勾画未来社会的蓝图，俄国一代代知识分子起到的正是这个重要作用。

Civilization 西方文明历程

破解俄国现代化之谜

从书房到图书馆

□赵畅

旷古以来，始有书籍，尔后有书房、藏书楼、图书馆。

早在原始社会中后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学会结绳记事。如果说，结绳记事还只是书籍的萌芽或书籍产生的前奏的话，那么，到了三千多年前的商朝产生了刻有文字的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以及刻（或铸）有文字的青铜器和刻有文字的石鼓，则是名副其实的书籍了。其后，书籍的形式又逐渐发展成为竹简木牍、羊皮书、缣帛书，等等。随着唐代发明印刷术，我国便进入印本书时期，盛行册页制度。所谓册页制，就是积累许多单页装订成为一册，其中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书。清代中叶以后，我国逐渐采用了机械化的新式印刷术，并产生了图书的平装和精装。

在古代，书房怕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的过程的。然无论是书生文人抑或达官贵人，不管是出于何种欲求，既是书房，便注定讲究一个雅字，以与书房之儒相结合。唐代刘禹锡虽只有一间简陋的书房，但“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在苏州留园，其揖峰轩，除轩外有亭廊石竹而外，轩内榻屏桌椅俱全，棋琴书画皆备，可谓幽静、秀美、典雅。中国当代文人的理想，亦自是求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一位文友说得好：“书生，当以书为生，为书而生。一间自己的书房，是读书人的安身立命之所。”书房被提升到这样的地位，是不是书籍的荣幸、社会的进步呢？

国人如此，外国人亦然。美国幽默大师马克·吐温的书房是一间八边形小屋，七面有窗，可以观赏周围风光。法国文豪雨果在盖纳西岛的工作室是位于该岛最高点的一间“瞭望台”，它的天花板和墙壁都装有玻璃，可俯瞰大海，仰望蓝天，名为“水晶宫”。

文人对书房，自是钟爱有加，有诗为证：著名作家舒芜的斋名为“碧空楼”，画家黄苗子曾题“浣溪沙”词二阕，内均嵌有“碧空”二字，其一云：“文到桐城王气终，海峰惜抱灭前踪，堂堂通雅是家风。阅史转怜天水碧，曝书哪怕肚皮空。有书不富也称翁。”其二云：“三耳交深继雪峰，贬褒求是岂明翁，红楼说梦梦无踪。醉星看朱真个碧，水中捉月总成空。书生无意计穷通。”难怪罗曼·罗兰说：“一个文人的其他生活环境、日用器物，都比不上书房能传达他的心理风貌。书房，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床。”信夫！

实现从书房到图书馆的跨越，藏书楼该是起到过一定的媒介作用的——或许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宁波天一阁，是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楼，创建于嘉靖四十年至五十年之间，距今430余载，是我国现存最为古老的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之一。原藏书七万余卷，现保存下来的图书绝大部分是明代的刻本和抄本，其中不少已是海内孤本。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诏修《四库全书》，向全国各地采访遗书。天一阁进呈藏书竟达638种，为《四库全书》的修成作出卓越的贡献。天一阁藏书楼无疑在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薪火相传中占有重要的一席。而天一阁等各大藏书楼于人类文化的精神导引、永恒传承的真谛，又何以不引发人们建造国家图书馆的念想呢？

据记载，清政府时，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三人在考察了英、法、意等国的图书馆以后，探讨中国的藏书楼与西方图书馆的优劣，方知：要强国需要书。于是，便向政府力倡兴办国家图书馆。1892年，郑观应呼吁：大办西式藏书楼，购中外有用之书，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借阅书的凭证），即可遍读群书。1895年，梁启超、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建议开设“西式藏书楼”。虽皇上不开恩，但民间大办西式藏书楼的风气盛行了起来。1902年，清政府颁行《学堂章程》，首次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了从日本引进的“图书馆”一词。1909年，清学部奏请筹建京师图书馆，要求将文津阁《四库全书》及避暑山庄各殿座陈书籍，一并交京师图书馆存储。1909年，宣统御批兴建京师图书馆。1912年8月27日，位于北京地安门外什刹海广化寺的京师图书馆，正式对读者开放。这也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发端。

开放的国家图书馆，非封闭的私人藏书楼与之堪比。对一个国家、一座城市而言，图书馆实在是太重要了。据说，牛津是世界上藏书最多的地方。牛津地下没有地铁，但却有一个世界最大规模的图书馆，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各学院图书馆所需借阅的书，只须签章申报，通过地下传送单，自动分解，传送到预定地点。地面上各学院、各系的图书馆中开放的图书达963500册，且图书馆全天开放。在英国，不必说大学，从学前班到小学、中学，每个学生放学前都可到图书馆借书回家阅读。英国的国民素质日益提高，是不是跟图书馆林立跟英国人勤奋读书有着很大的关联呢？英国戏剧家萧伯纳在他的《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一书中谈到过图书馆，说图书馆是人类的头颅。在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如果看不见这样一颗头颅，不是拿掉了文化的记忆，失掉了生命的重心么？有人说，要毁灭一个国家，没有比毁灭它的图书馆更直接更有效的了。毁灭了它的图书馆，也便等于毁灭了它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记忆。没有比一个国家突然失去文化的链接更可怕的事情。

于是，终让人想及，1933年5月10日，德国法西斯下命令，凡是不合他们口味的书都要焚毁，从而掀起了一个全国焚书的行动。为了使人们不忘这一历史教训，两年前，在新修复的柏林中心国家图书馆广场的平地上，用厚厚的防弹玻璃开了一个地窗，下面是一个地下藏书馆，四壁书架空空荡荡，地窗旁边的说明上写着：1933年5月10日，该国家图书馆的图书被法西斯焚毁。德国人的痛定思痛之举，让人沉思。

风俗，用历史眼光解读

□刘志琴

风俗既是历史的产物，它就不可避免地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但凡能够存在的，都有它依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沧海桑田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制度的更迭，都会促使风俗变迁，有些旧风俗的衰亡犹如新风俗的兴起一样，是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是合理的现象，衰亡的不一定都要复兴，有的不妨让其自生自灭。例如建国初有的少数民族文字已经消亡，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曾经帮助这些民族恢复文字，但事与愿违，不受当地人的欢迎，因为他们认为学会本民族的文字，走不出家乡，宁可选择学汉字。但是，这文字既然在历史上存在过，就是一份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需要作为文物保存在历史记忆中，让现代人感知先人的智慧，使其亡而不忘。精神产品可以作为非物质遗产保存，作为物质产品更有保留、生产的可能，某些传统的工艺品，具有鉴赏和收藏的永久价值，需要大力保护、扶持，使之代代相承。至于传统的人生礼俗、节庆礼仪因为富有人情味，为现代人增添生活情趣，丰富精神世界，更应得到发掘、保存。

风俗是历史形成的，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可以用文字来追述，也可以用风俗来演示，不论是文字表述还是风俗演示，都要经过现代人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剪裁和加工。作为专业研究的对象，风俗的良莠都有研究的价值，作为向民众的展示，需要去芜存精，扬长避短，反映现代人的理解和研究成果，而又不失历史的本来面貌。风俗演示比文字的研究成果更胜一筹的是直观性与形象性。人们都说新世纪的读书活动已进入读图时代，要将平面的图象活动起来，使之有声有色，最佳的方式就是进行风俗演示。

演示是复制的艺术，这不是简单的复原，而是艺术的再现。这就需要识别、筛选，并加以合理的解释，使民众不仅看到民俗风情是这样，还要认识为什么是这样，透过民俗的种种表现，认识现象背后所蕴藏的一般知识和信仰，通过观赏给观众生动有趣的历史教育。

在原始居民中普遍存在过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这是人类最原始的信仰，由于人的认识能力处于初级阶段，不能把自己与自然区分，人类与自然融为一体成为普遍的思维方式，因此神话传说与迷信混杂一体，合理的不合理的难分难解，经过辨析可以发现其中的合理因素，如青海地区的原始苯教是多神信仰，龙是之一，龙住在地下、河湖、井下，又能住在山顶。还有年神藏在树林和岩石中。有《赎罪诗》说：“龙王住在所有河流中，年王住在所有的树上和岩石上。”这些山林岩石由于有龙和年神成为神圣的地方，人们不敢随意侵犯。在青海湟中、化隆、贵德三县交界处，有一股清冽的泉水，当地人认为有泉水的地方就有水神“鲁”，因此不敢在泉水旁挖土，随地大小便，有的树林被视为神树不能随意砍伐。在神农架过春节，当地人吃年夜饭，每家每户都要给牛羊一顿丰富的美餐，还要把美食浇在树上，给树木“喂饭”，不仅如此，连一些生产工具如石磨，也要放上食品，以便让这些为人类默默作出贡献的生灵、实物与人们分享节日的欢乐。在这一年一度的佳节，人们早已习惯称颂普天同庆，然而这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喜庆，殊不知在这荒僻的地区，却真正实现了人与动物、植物、用具的欢乐与共、生息同嬉的境界，这些保护环境的朦胧意识，体现了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处的生态风俗，仅此一点就足以使现代人反思。

这种自然崇拜还延伸到对宇宙的生成，作出贴近唯物主义的解释，以藏族家喻户晓的一部史诗《斯巴问答歌》为例，斯巴是存在、宇宙的意思，斯巴初形成时，混沌一片，因为有了太阳、大鹏，这才分开天地阴阳，对高山、河流、道路、大地的生成一一有朴素的认识。说是斯巴宰牛，把牛头放在山上所以顶峰高耸，把牛尾放在路上所以道路弯曲，把牛皮铺大地，所以大地平坦。这种不以神仙而以物质因素解释山川地势，与汉族盘古氏开天辟地的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神话传说往往伴有各种音乐、舞蹈和神秘的仪式，可以栩栩如生地再现。

在少数民族宗教神话礼仪中俯拾皆是的自然崇拜和朴素的生态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现代都市居民向往大自然的愿望。最古老的神话宗教礼仪与现代人的情怀，在这感觉中相互交融，这是风俗得以引人入胜的心理基础。

风俗新论[10]

穿过时光的电闪

□安然

我喜爱中国历史，因为她源远流长。我最爱春秋战国那段中华文化的原生时代，因为她令我激动、自豪，同时更让我面对历史惭愧和反思，像穿过时光的电闪。

春秋战国上下五百余载，是中国历史上最充满活力的黄金时代，是个“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烈变化时代。依今人之说，那是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崛起，从而在社会整体上大转型的时代，这使得那个时代的人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还是军事家、教育家，是侠，是士，其生命状态无一不是饱满昂扬奋进向上的，充溢着一种不可遏止的进取精神和非凡的创造力。

那是个讲究谋略的阴谋时代，所以智慧丛生色彩斑斓；那是个本色人生的时代，所以仕学争鸣侠隐飘逸，摇唇鼓舌皆成风流；那是个实力竞争的时代，所以强国富民为本，虚伪的文过饰非的理论无法泛滥；那是个深刻思索、创造思想、成就学问、铸造精神的时代，是中华文化的原生代，所以出现了各种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灿烂辉煌的景象。

在我耳熟能详的中国伟人中，有一半多的伟人属于那个伟大的时代，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神秘文化……几乎所有基本领域，都在那个时代开山立宗并创造了我们民族精神的最高经典，不仅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而且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人类文化的殿堂。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变革最为活跃的时代，五霸迭兴，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七雄兴衰，此起彼伏。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教育从戎与祀中挣脱出来，孔子私学，稷下学宫，最终实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学吏教育制度；文学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文艺作品林林总总，诗歌、辞赋、小说、散文皆为后世之滥觞，这时期有《楚辞》的铺陈抒情、浪漫想象；有《论语》、《孟子》的雍容和顺、灵活善譬；有《庄子》的想象丰富、奇气袭人；有《韩非子》的锋利峭刻、研箴析理；艺术更见洋洋大观，青铜器绚烂多彩，金玉精琢叹为观止，铭文风韵为篆刻艺术之典范；宋音楚舞，边磬编钟，宫殿廊城，髹漆彩绘无一不在世界艺术史上熠熠生辉，光彩夺目。科学技术可谓灿烂辉煌，光学物理、阴阳五行、染色麻织、灌溉堤防、经络学说，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所取得的科技成就绝对遥遥领先于世界；当时的争霸战已经是车步兵联合作战，水陆军协同争先的大规模战争，在战争中诞生了孙武、司马穰苴、吴起、孙膑、尉缭等等伟大军事家，他们的集古代兵家大成之作，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对世界各国军事理论和战争依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原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是这个民族精神生命的源。当人们被各种复杂的问题困扰时，当人们在浮华喧嚣的历史泡沫面前迷失或不知所措时，应该去到我们的原生文化宝库中寻求再生的动力。

两千多年过去了，那个民族文化原生代所创造的精神，并没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渐行渐远，依然博大精深，风采依旧！

面对历史，梳理春秋战国500多年风云变幻及国家强弱兴衰之演变轨迹，窥探中国文化原生代的恢宏博大与灿烂辉煌，眼前便浮现出了当年诸子百家和侠客名士的神采风流，他们像穿过时光的电闪，照亮了周围的昏暗，我那日渐干涸的精神又被滋润并激荡起来。

Thinking 有所思

意大利文艺复兴：浓重的异教文化气息

□郝秉键

中世纪的欧洲处在基督教文化笼罩之下，总体宗教文化倾向是独尊基督、排斥异教文化。但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巨人们并没有囿于这一传统，相反力图借鉴异教文化来探寻文艺变革的方向，这就使意大利文艺复兴散发出浓重的异教文化气息。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具有明显的尚古倾向，以致后来人们将这场从意大利兴起的思想文化运动看作是古代文艺的“复兴”。这种尚古倾向虽然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存在，但它们只是零星地、有选择地借鉴古代文化的某些成分，不像意大利那样“无论有学问的或一般人民，他们的情感都自然而然地投向了整个古典文化那一方面去”，并认为这是伟大过去的象征。但丁可谓是把古代异教文化推向民族文化最前列的人。他敏锐地洞察到“古代文明在每一种使人感到兴趣的精神事业上都具有丰富的真理知识”，因此，摒弃了狭隘的独尊基督意识，力图从古代罗马的异教文化光辉中去寻求民族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神曲》就是宣扬异教文化的杰作。在这部书中，但丁对一些异教徒，包括古代著名诗人、学者以及中世纪伊斯兰教的杰出人物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将他们的幽魂安置在一座美丽的城堡里。彼特拉克被人称为“古代文化的活代表”，他努力“模仿各种体裁的拉丁诗歌，力求用他卷帙浩繁的历史和哲学著作来介绍古人的作品”。薄伽丘在“三个戒指”和“裁判官”里也呼吁信仰自由，抨击宗教裁判所对异教徒的血腥迫害。在他眼里，犹太教、回教、基督教均得到上帝法律的认可。不仅如此，人文主义者在崇尚古典文化的同时，对异教的东方文化也进行了研究。当时意大利设有专门的西伯来文、阿拉伯文讲习所，一大批人文主义者在此任教、学习，德意志出现了“对西伯来文的学习变得如此普及甚至比希腊语还更受欢迎”的势头。米朗多拉是一位著名的东方学学者，他对犹太教的法典、犹太教神秘哲学颇有研究。巴尔美斯是西伯来文化的传播者，毕生从事翻译工作，其翻译的西伯来文作品直到17世纪才公开为人传诵。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异教气息还表现在人文主义者在“宗教上完全流于主观”，并日趋世俗化。布克哈特说：“当北欧的神秘的禁欲教派急于为他们的新的思想感情方式创造新的形态时，在意大利每一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并且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生活的海洋中飘荡而没有任何宗教指引。”而这一特点正是教会世俗化造成的。文艺复兴期间，教会势力在追逐世俗权力的过程中日益世俗化，大批神职人员包括教皇、红衣主教热衷于世俗享乐，甚至腐化堕落。马基雅弗利因而得出“我们意大利人较之其他国家的人更不相信宗教”的结论。他认为，意大利人之所以发生宗教信仰危机，主要“因为教会和它的代表们给我们树立了最坏的榜样。”这一状况在人文主义者的作品中得到反映。卢吉·普尔奇在《库尔根特》中塑造了马尔固特的形象，他“漠视一切宗教，快活地承认他有种种恶行和肉欲”。由于宗教观念的淡化，不少人文主义者对《圣经》公开质疑甚至批判。加布列·达·萨洛医生指出，基督不是神，是约瑟夫和玛利亚的儿子，并且和一般人一样受胎。布鲁诺更认为天主教会关于上帝具有“三位一体”性的教义是错误的。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不仅崇尚异教文化，也是基督教的批判者。他们以异教文化来填补基督教文化的不足，以异教徒精神来批评基督教教义的虚妄，从而使意大利文艺复兴呈现异教文化的特征，因此人们常把“意大利的‘异教徒’人文主义与北方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区别开来”